



溺水已成低龄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首因 未成年人溺亡事故为何周而复始

-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岁至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
- 未成年人溺水主观上存在六大因素:无知危险、无视警示、好奇心强、侥幸心理、恐惧心理、技能缺失
- 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刻不容缓,需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实习生 王悦月

8月6日13时许,在江西上饶信州区甜坑水库,两名少年发生溺水。当地蓝天救援队经过救援,将少年打捞上岸,但已无生命体征。两名溺亡少年分别为14岁、15岁。

如此令人心痛的未成年人溺亡事故,正在接连不断地发生。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少年儿童溺水死亡人数占总数的56%,远高于交通事故和失足跌落的意外伤害,而每年七八月是未成年人溺水高发季。

《法治日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6月以来,仅网上公开报道的未成年人溺亡事故就有30多起,上百名未成年人溺亡,其中多为野泳溺水,溺亡者多为农村青少年。

多名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刻不容缓,需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多重因素综合作用 暑期溺水事故频发

7月22日晚,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嘉会镇,3名小学生到离家附近的小河边玩耍,不慎意外落水溺亡,3人系亲兄妹;7月13日,河南驻马店6名学生在公园内溺水,在被送往医院时已经确认身亡;7月12日,浙江诸暨山阴镇6名男孩相约去家附近的河滩游泳,其中4人不幸溺亡。

暑假期间儿童独处时间增多,一系列溺亡事故给家长和社会敲响了警钟。

江西九江台山区蓝天救援队队长杨斌自2013年11月加入蓝天救援队后,每年都会接到多起未成年人溺水的救援任务,

最多的一次溺水儿童有6人。

据杨斌介绍,通过江西省内蓝天救援队的微信群动态能发现,每年4月中旬天气刚转热,就会有溺水事故频频发生。

有一次,同校的几个男孩结伴去水库旁玩耍,男孩在水库边洗手时不小心滑了下去,后面3个男孩赶紧去拉他,都没拉住,一下子4个男孩都溺水了。“我们到现场时快晚上12点了,水库四周非常寂静,当我们把孩子们的尸体一个个打捞上来后,家属号啕痛哭,哭声响彻整个山林。”杨斌回忆说。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岁至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并且我国未成年人溺水事故的高发时段主要集中在暑期。”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都培植说。

都培植分析,暑期溺水事故年年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暑期天气炎热,很多地方的未成年人都会进行游泳、戏水等活动;我国户外河流众多,部分危险水体安全隔离措施不到位,增加了未成年人溺水的风险;绝大多数未成年人处于学校监管之外,部分家长因工作等原因无法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监管,导致监管缺失。

之前有公开的统计分析显示,中小学生在溺水死亡事故中,多发生在周末、节假日或放学后;多发生在农村地区;多发生在无人看管的江河、池塘等野外水域;多发生在学生自行结伴游玩的过程中,有的是结伴下水游泳溺亡,有的是为救落水同伴致多人溺亡;多发生在小学生和初中生中,男生居多。

据专业人士剖析,未成年人溺水主观上存在六大因素:无知危险、无视警示、好奇心强、侥幸心理、恐惧心理、技能缺失。

“一些群体性溺水事故,都是因为孩子们结伴到水边玩,出于好奇心玩水,又对水域的危险性缺乏基本认知。”杨斌说。

记者梳理发现,实际上,很多溺亡事

故事发地周围都有“水深危险,禁止游泳”等警示标志,而且非常醒目,但不少未成年人对警示标志熟视无睹,依然下水游泳,进而导致溺亡悲剧发生。即便发生溺亡事故后,附近依然有不少人下水游泳,造成溺水事故周而复始地发生。

强化预防溺水教育 增加基础设施建设

江西省彭泽县于2017年组建蓝天救援队,担任队长的朱浩海参与当地所有的救援活动,近年他和队员一起开展了40余场防溺水宣传教育。他所在的彭泽县各乡镇也在河边、水库等危险水域设立了警示牌,放置了救生杆等救援设备。

“未成年人喜欢游泳,并没有错,有关部门要在公共游泳馆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入,最好是每个乡镇都能建一座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游泳馆,并加强游泳技能的培训。”朱浩海说,有关部门应加强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防溺水宣传教育。

“要想降低溺水事故发生率,减少悲剧的发生,就要把风险扼杀在摇篮里。”朱浩海说,主动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势在必行,彭泽蓝天救援队主动走进彭泽各个中小学校和社区,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讲座,目前已覆盖全县所有学校,直接受益学生达万余名,很多学生掌握了发生溺水时如何自救互救的技能。

都培植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强化预防溺水教育,告诫未成年人在没有安全保护措施时不下水,远离危险水体;强化监管,在校期间,由学校主要负责,离校期间,由家长切实履行好监管职责;教授未成年人游泳技能,相关部门应提供价格亲民且方便的公共游泳场所,引导未成年人在游泳场所内游泳;对于过去高发、易发溺水案件的水源地,采用栅栏隔离、视频监控、定期巡逻等方式让未成

年人远离危险水域。

“值得注意的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存在互助义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未成年人在发现同伴溺水后应当履行与其行为能力相符的救助行为,如呼救、上岸救助等。”都培植强调。

世界卫生组织也曾从社区层面给出建议:通过安装屏障来控制与水域的接触;为学龄前儿童提供远离水域的安全场所,并加强对儿童的监管;教龄前儿童基本的游泳和水上安全技能;对公众进行安全救援和复苏等专业训练;强化公众安全意识并强调儿童的脆弱性等。

逐步推广儿童主任 守护留守儿童平安

记者注意到,在农村,很多父母外出打工,无法对孩子进行有效看管,暑期监管更是缺位。那么,应该如何解决农村未成年人监护不足的问题?

6月8日,民政部印发《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每个村(社区)至少设立一名“儿童主任”。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奇认为,当下应进一步推广“儿童主任”的设立,由村干部、大学生村官、学校老师、社会专业工作者等担任,负责辖区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的关爱服务工作,通过加强对留守儿童的教育、管理,组织一些有吸引力的活动,提高其安全意识,保护留守儿童的平安。

在都培植看来,农村未成年人溺亡事故频发,除了监护人监护、看护缺失以及履责不到位之外,保护措施相对薄弱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应当投入资金与人员来解决这一问题。

制图/高岳

□ 本报记者 文丽娟 王家梁
□ 本报见习记者 孙天骄

化屋村的杨清鑫现在已经安心做起“巡河员”的工作了。这个在乌江边长大的“捕鱼大户”曾固执地认为“不打鱼还能干什么”,面对长江十年“禁渔令”,他带领愤怒的渔民在六冲河(乌江最大的支流)边集结,向前来执法的人员要个说法。

矛盾最终还是化解了。这得益于贵州省针对基层社会治理探索出的“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治理机制,这个机制激活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居民自治功能,杨清鑫和渔民们的问题能得到解决源于于此。

打通神经末梢 催动村落转型

化屋村原名“化屋基”,意为“悬崖下的村寨”。六冲河与悬崖相依,组成风景如画的乌江源百里画廊,化屋村人依山傍水而居。化屋村属于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市新仁苗族乡,从新仁乡出发到化屋村要穿越十几公里山路,绕道二十多道弯,过去,这个悬崖下的村落因自然条件闭塞而深陷贫困,只能“靠水吃水”,以捕鱼为生。

自去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施为期十年的“禁渔令”。长江上游南岸最大支流——乌江亦在“禁渔令”政策范围内,以捕鱼为重要经济来源的化屋村村民,被禁止下江捕鱼。

这对杨清鑫和其他渔民来说是致命的打击。“这是要断了我们的生路!”随着杨清鑫的一声吆喝,化屋村大量渔民涌向河边,与前来执法的人员起了冲突。

一边是生态,一边是生计,执法人员面对渔民有点“下不去手”。化屋村联户长杨国辅接到消息后,火速赶到河边处置这起突发事件。向清楚杨清鑫等人的诉求后,杨国辅耐心地与他们解释:“禁渔令”是为全大局、为子孙谋的重大决策,得看长远,要给予后代积福。”

事件平息后,杨国辅和化屋村其他21个联户长走家串户宣传“禁渔令”,为渔民退捕上岸后的生计出谋划策。在联户长的推动下,化屋村开始转型,有的渔民当起了农家乐的小老板,有的渔民被聘为保洁员,河面打捞员。杨清鑫也从打鱼转向护水,变成“巡河员”,每月能领3000元。如今,化屋村近50户的网箱养鱼全面撤除,40多艘渔船全部上岸,这里变成了环境优美、产业强、群众富的生态旅游村。

化屋村的成功转型,让贵州省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人员对推进“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治理机制更有信心了。

贵州省委政法委基层社会治理处副处长王家志告诉《法治日报》记者,所谓“一中心”,是指综治中心,即建设县级、乡级、村级综治中心;“一张网”是指服务的网格化,将城镇社区、农村、部分企事业单位划分专属网格;“十联户”则是指按照“住户相邻、邻里守望”原则,将相对集中居住的村(居)民按照十户左右标准划分联防联治服务单元。

“我们充分发挥群众自治作用,因地制宜划小治理单元,把排查预防和服务治理机制向村居、向家庭延伸,努力将‘十联户’单元打造成采集信息、发现风险的第一感知触角,化解矛盾,消除隐患的第一响应阵地。”毕节市副市长、市委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王治军说。

以前遇事不决 现在群策群力

余下村是贵州省龙里县龙山镇9个自然村寨之一,有118户478人,党员11人。该村以党建工作向社会治理延伸,形成“党小组+网格长+联户长”的管理模式,其中蔡家院组51岁的文吉龙因能力出众,将网格长和联户长一肩挑。

“之前没有联户长,村民遇到问题要向村组求助,而村组人手有限,根本忙不过来,也无法经常到户了解需求,所以常常遇事不决,一些小摩擦不能及时化解,容易变成大问题。”文吉龙说。

而现在,蔡家院党小组将老党员、老党员、老教师、老军人及群众威望高的寨老吸收到社会治理队伍中,设置网格长和联户长,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各项事务。

如今,文吉龙成为联户长已经一年多。在他眼里,自治模式创新以来,蔡家院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联户长帮忙收集、反映和处理村民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调解邻里矛盾,整个村子的氛围更和谐了。”

“遇到麻烦了,只要想到能和联户长商量,我们比以前放心多了。”在干净、明亮的蔡家院文化广场,村民蔡吉祥和记者谈起联户长们做的工作时赞不绝口。

前段时间下雨,村子入口的主干道积满了水,人过车过都不方便。文吉龙发现后立即带着几个村民,用脸盆和水桶把积水舀出来,同时向村组反映了路面情况。现在,修整那条主干道已经被列入蔡家院组8月的工作计划。

尽管工作出色,文吉龙也有自己的“小困惑”——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服务能力?幸好,贵州省委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将网格员、联户长培训纳入基层平安建设队伍培训的重要内容,要求每名联户长一年至少培训一次以上。借此机会,文吉龙多次参加了县、镇、村三级组织的联户长素质培训,“能更加专业、全面地履职了。”

“联户长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优势,平时履行社情民意信息员、平安守护安全员、矛盾排查劝导员、政策法规宣传员、文明新风引导员、环境卫生监督员等职责,通过走街串户,第一时间感知风险,报告隐患,处理诉求,化解矛盾,畅通了社情民意表达渠道。”王家志说,这正是他们推出“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治理模式的初衷。

发现苗头隐患 及时防范化解

“大家相信我支持我,我也要努力为大家解决问题。”奋进社区45岁的联户长段相荣一边说着,一边向记者展示前不久街道办事处给她颁发的“星级网格员”荣誉证书。

奋进社区成立于2018年1月,位于贵州省龙里县冠山街道,是该县唯一一个县级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目前搬迁入住1143户4677人,少数民族人数较多,文化程度偏低。“社区矛盾复杂多样,如何将纠纷化解在基层考验联户长的智慧。”奋进社区居委会主任程群说。

段相荣有这样的智慧,不过这种智慧也是通过摸爬滚打,反复锤炼得来的。由于熟悉社区情况,为人热心,段相荣从一开始就被选为联户长,负责三栋楼。这三栋楼里,有几女外出打工的“空巢老人”,有没上过学找不到工作的无业游民……

各式各样的家庭,各种各样的问题,让当时的段相荣有点手忙脚乱。随着定期参加联户长素质培训,加上自己主动摸索方式方法,段相荣对联户长工作逐渐得心应手起来,主动上门服务,日常宣讲普法,参与禁毒宣传,用法律知识化解纠纷……渐渐地,居民们越来越支持和信任段相荣,邻里纠纷也越来越少了。

71岁的周治英老人独居在家。有一天,他颤颤巍巍地来到段相荣家,说要起诉儿子,理由是儿子常年在外工作不照顾老人。

“您先别急,这种情况不属于法律规定的子女不赡养老人情况。就算有赡养纠纷,也不能只告儿子,女儿也会一同被追加为被告。”段相荣刚学了相关的法律知识,便现学现用安抚老人。

老人听罢,打消了起诉的想法。不过这件事情让段相荣意识到,“空巢老人”也需要照顾和陪伴。此后她便经常上门拜访那些老人,看看他们有没有生活上的需要,有时还会利用空闲时间把老人集中在社区广场,聊聊困难,群策群力解决问题,顺便普及一些法律知识。

龙里县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汪永丽说,龙里县结合实际,坚持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将志愿服务活动与联户单元职责有机融合,提升联户长履行十联职责和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下一步,将继续一体推进县、镇、村三级综治中心建设和全县“一张网”管理,做实做细做好“十联户”,织牢基层社会治理网底。

同样将“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机制推进社区的,还有贵阳市南明区西湖路街道办事处。他们将按照居十户一联户,高楼小区按单元选取楼栋长的形式,配备了76名联户长(楼栋长),建成34个网格党小组,网格党小组联合社区民警、网格员、物业、热心群众构建联户服务团队,开展信息采集、疫情防控、矛盾纠纷调解等工作,建立“上联网络下联群众”工作机制,确保联户长掌握党的政策方针,辖区房屋人员情况和辖区各类矛盾隐患,及时发现、及时上报,及时向所在居委会汇报、及时做好维稳工作。

据统计,贵州省目前已经规范化建设县级综治中心96个,乡级综治中心1510个,村级综治中心17679个,覆盖率分别达到97.96%、99.4%、99.71%;共划分138006个网格,配备网格员178167人。去年,贵州省联户长共开展入户重点走访排查119918次,发现报告“民转刑”苗头隐患5816条,帮助群众解决了大量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打通了宣传、教育、关心、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

“通过创新‘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治理机制,发挥‘党小组+网格员+十联户’铁三角作用,常态化开展大走访等,我们探索出一条具有时代特征、西部特色的基层治理新路子,有效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了贵州的‘大平安’。”贵州省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程荣表示。

人熟地熟情况熟 联户长守平安有神通

贵州走出一条西部特色基层治理新路子

防疫一线民警忙 汗水浸透警察蓝



近期,江苏省南京市、徐州市核酸检测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两地公安民警辅警头顶骄阳烈日,筑牢疫情防控“一线屏障”。

图① 南京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八大队民警在收费站查验点对离宁车辆进行安全检查。

图② 徐州市公安局淮海港务区分局民警在疫苗接种点执勤,维持秩序。

图③ 徐州市睢宁县公安局沙集镇派出所辅警坚守在沙集与宿迁市交界处的防疫交通卡口。

本报记者 丁国锋
本报通讯员 叶建华
杨路 冯慧慧 摄



连日来,河南省郑州市出现高温天气,路面温度高达40摄氏度以上,公安民警冒着酷暑,在全市各个核酸检测点和高速公路站口维持秩序,确保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图④ 民警在中风险地区执勤时,抽空解开防护服,抖落身上的汗水。

图⑤ 民警在执勤间隙补充水分。

图⑥ 民警在陇海路西路段高速公路站口检查司乘人员的核酸检测证明。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摄



图⑦ 民警在执勤间隙补充水分。

图⑧ 民警在执勤间隙补充水分。

图⑨ 民警在执勤间隙补充水分。

图⑩ 民警在执勤间隙补充水分。

图⑪ 民警在执勤间隙补充水分。

图⑫ 民警在执勤间隙补充水分。

图⑬ 民警在执勤间隙补充水分。

图⑭ 民警在执勤间隙补充水分。

战疫·影像